

黄孝  
诗选



黄茅岭诗选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## 黄宁婴诗选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6.625印张 1插图 60页

1980年3月第1版 1980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5,000册

书号 10111·1206 定价 0.54元

# 黄宁婴的生活道路和他的诗

## ——代序

陈 残 云

一九三六年冬天，广州文化界在中山大学举行鲁迅追悼会。在会上，我认识了黄宁婴，彼此都是写诗的，在报刊上看过了名字，一见如故。嗣后，通过他，我参加了“广州艺协”的诗歌组，认识了温流、叶春、陈芦荻、李六石、黄鲁、李又华、陈华、李育中、陈继武、苏韩彦、陈炳熙等一群写诗的朋友，参与了进步的诗歌运动。这些年青的诗友，大都是穷苦的学生，有些是小职员、小军官，核心人物是温流、宁婴、夏子和芦荻。他们都是中大学生，除主办了诗歌刊物《广州诗坛》以外，还掌握了中大的学生刊物《文学生活》。

当时广东的统治者是陈济棠，政治上很反动，经常逮捕革命者和进步学生。我们的诗歌

运动是和全国的左翼诗歌运动联在一起的，与上海、北平等地的诗歌组织有联系，受到反动当局的注视。我们一周或两周举行一次谈诗论政的座谈会，不能不经常变换地址，有时在温流的住处，有时在我的住处，有时在观音山上，有时在宁婴家里。温流工作很积极，诗的战斗性很强，是我们活动的中心，受到大家的爱护和推崇。后来他因鲠鱼骨，死于庸医之手，我们的活动中心便落在宁婴身上。

宁婴生长在一个宽裕的家庭。父亲是中山大学会计主任，工资较高，置了房子，一家子过得很安适。宁婴从幼儿园到大学，都是一步步按着学制升级，平静而愉快地过着读书生活，养成了一个循规蹈矩的较为软弱的性格。但他开朗而爽直，待人热情和蔼，可亲可爱，从来不轻视生活潦倒的朋友。由于他热爱新诗，又多和贫困正直的进步诗友接触，受到了影响，他憎恨官僚专政的旧社会，追求光明，爱国，反蒋抗日，把光明的期望寄托在共产主义革命者的身上。

他曾经是资产阶级诗歌流派的拥护者，也写过象征主义的诗。但当我和他接近的时候，他已经从象征主义的软绵绵的沙发上站起，走

了出来，高叫“我觉醒了”，要求民主，要求抗战，“喊出新生的歌唱！”那时候，他思想比我进步，我写的还是一些象征性的苦闷朦胧的小诗。记得有一次在诗歌组座谈会上，主持会议的李六石，把我发表在上海一个小刊物上的一首短诗拿来批判，我很不理解。会后，宁婴为我抱不平，对我说：“李六石批评了你的诗，有些过火。”那时，我是一个私立大学的学生，没有参加过政治运动，政治上还很无知，对李的过左行为一无所觉，只觉得他对人傲慢、冷淡，不象宁婴那样亲切、诚恳。

在旧社会里，象我这样出身微贱，泥土气很重的寒伧的大学生，人们是看不上眼的，自己也有自卑感。但宁婴平易近人，对我毫不见外，而且很友好，因此我乐于和他亲近。由于接触得多，思想感情和对新诗的看法，也很接近。例如当时《广州诗坛》发表的诗作，有些粗糙，我们感到不满足，而且篇幅有限，影响不广，便和芦荻、黄鲁等四人自费办了一个诗刊《诗场》，还邀请欧外鸥参加，是同人刊物。同时自费出版了“诗场丛书”，内有宁婴的《九月的太阳》，芦荻的《桑野》，黄鲁的《赤道线上》，我的《铁蹄下的歌手》。在这些活动中，宁婴是积极的倡导者。

抗日战争爆发以后，宁婴跟大家一起，兴奋地投身于抗战的群众运动。出版诗传单，到广播电台和十字街头朗诵抗敌诗，到马路上募捐，慰问抗战伤员等等。在创作上，他写了不少感情强烈的诗篇。在《芦沟桥》里，他愤怒地呼喊：

六年来的屈辱，  
六年来的血账，  
让我们一朝清偿！  
他来一个，我杀一个！  
他来两个，我杀一双！  
来吧，疯狗，野心的豺狼，  
用骑兵，用飞机掩护着步兵来吧，  
我们有手榴弹，有大刀，有枪，  
我们更有炸不碎的  
复仇的心，象火一样！

这铿锵的诗句，表现了一位廿三岁的爱国青年，迸发出对敌斗争的复仇火焰。

随着抗战形势的不断变化，许多文艺界人士南来广州，诗歌的战友蒲风、林林、雷石榆、征军、蒋锡金也来了，广州的诗歌运动有了新的发展。宁婴把蒲风接到家里住，让他主持《广

州诗坛》。当时全国的两个文化中心上海和北平，已经沦陷了，汉口、广州便成为两个政治和文化的中心。蒲风和我们商量，将地域性的诗刊改为《中国诗坛》，大家同意了，《中国诗坛》就以更多的篇幅和崭新的面貌与读者见面，内有郭沫若同志的题词。以后，宁婴协助蒲风处理编务。

蒲风是一个工作勤奋、认真，而作风又十分呆板的人，年纪比我们大不了几年，却显得很老成，很孤僻，在生活上和我们格格不入。宁婴和我有时上茶楼去，他看见了就批评：“你们有时间怎不多写几首诗，要上茶楼？”他提倡诗歌的斯达哈诺夫运动，提倡明信片诗，见了什么人都鼓励人家写诗，我们并不赞同他这种做法，但对他是很尊敬的，宁婴对他象老师一样敬重。后来我们上茶楼却不让他知道，免得受他批评。

蒲风在宁婴家里住了一段时间，宁婴待他如同上宾，生活上多方关照。蒲风好象是党员，和尹林平同志有来往，他常和宁婴谈诗，谈政治，对宁婴的思想有较大的影响。后来蒲风到国民党军队九二二团工作去了，该团的团长是著名“一·二八”上海抗战的炮手；蒲风在这



个部队里很受尊重。当时，这部队驻扎在从化，蒲风常回广州来。有一次，蒲风回到广州，破例地请宁婴和我到茶楼饮茶，动员我们参加国民党军队，说：“现在是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，还读什么书，参军去吧！”宁婴大学即将毕业了，没有去，我也没有去。我们留在广州和雷石榆、芦荻一起继续出版《中国诗坛》。

一九三八年十月中旬，国民党军队在日寇面前惊惶失措，一闻炮声就溃败了，弃了广州慌忙逃遁。宁婴在慌乱中去了香港，我去了粤北。半年之后，我亦辗转到了香港，又和宁婴见了面，那时他已有了一个女孩，生活困难，他在九龙一间小咖啡店当店员，以微薄的工资来养活一家三口。一个大学毕业生，又是诗人，为了糊口去当小店员，颇受委屈，我和他一同在这小咖啡店喝咖啡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情都同样地难受。我希望他回到内地去，离开这寄人篱下的卑微生活。但他缺乏勇气，他害怕回到内地活不下去。这时候，宁婴的精神状态是矛盾的，痛苦的。

在痛苦中，他怀念“在兽性的蹄爪下”的家乡。希望有一天，“流水冲去”了“最后的一个仇敌”，让他“对着累累的荔枝，爆炸一串串红笑。”

他想念“遥远的矿区”，赞颂“为苦难的祖国

担当苦难”的人，自己也想“扎一束轻便的行囊”，“赶上苏生的前线”。但他有家室的牵累，跑不了，徒有“请缨的痴念”，只好低唱着：

我呢？天天在异乡的堤岸，  
守望着海的那边，那边  
可曾漂来一片白帆。

终于在一九四〇年夏初，“一片白帆”把他带走了。他离开了香港，绕道粤北、江西、湖南，到达桂林。道路艰辛曲折，交通不便，这对过惯了舒适生活的年青诗人，是一个很好的考验，他第一次接触了祖国辽阔的山野，第一次接触了农村中劳苦的群众，有许多新的感受，写了不少鼓吹团结抗战和控诉日寇残害劳苦者的诗，象《省界》、《彭三婆》等等。

桂林，被称为文化城。我又和宁婴在这里碰头了，同在一个中学教书，朝夕相见。芦荻也在《广西日报》当副刊编辑，我们共同复刊了《中国诗坛》。这远离烽火的山城，聚集着许多文化人，生活比较平静，政治上有虚假的民主，一时显出一点“团结抗战”的活跃景象来，宁婴在香港时那种屈居人下的抑压情绪，被新

的气氛驱散了，心情愉快。这期间，蒲风突然出现在我们的面前，他与新婚的夫人同行，人也变得年青活泼，与昔日的古板作风截然相反。他们要假道桂林转去新四军。宁婴征得蒲风的同意，让两位年轻的妻弟同投新四军。

不多久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国民党反动派，突然围攻了新四军的军部，形势变得紧张，桂林的民主空气，被杀气腾腾的刀光剑影划破了，一些进步人士纷纷潜匿、外逃，我也转到偏僻的县城去教书。宁婴有家小，跑不了，转到另一间不引人注目的学校继续任教。

许多相知的朋友都走散了，爱热闹的宁婴，生活得很寂寞，而且有孤独之感。但他并不消沉，并不失望。在一个深秋里，他鼓励自己说：

我必须孤独地  
孤独地走着  
而且  
穿过了秃立的林野  
穿过了空漠的荒丘  
我必须孤独地  
孤独地走完

这漫漫的长路呵

因为通过它

我将到达

一个大家所盼望的地方

什么是大家盼望的地方？是革命的圣地，是中国共产党所要达到的新的世界。宁婴曾向我表示过，他要参加共产党，但当时我不是党员，不能帮助他成全这一愿望。

在寂寞的生活中，宁婴把自己比作酷暑中的青椒，比作是青椒“倔强而坚实的邻人”，还感到有这样的邻人而骄傲。他的脆弱的感情，经过烽火漫天的现实生活的磨练，变得坚实了。

他曾经冒着生命的危险，回到沦陷了的家乡广州，看到美好的国土遭受敌人的践踏，无限痛心地说：

好一幅绣锦的国画呀

你还要添加什么颜色

除了一腔惆怅几点热泪

他和沦陷区的人民心心相连。面对破碎的河

山，被蹂躏的劳苦大众，饥饿愁苦的亲人，他流着悲愤的眼泪。用泪水来描绘人民的痛苦生活，控诉残暴的日本侵略者。

对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为，我与宁婴有相同的切身感受。一九四四年一月，当宁婴从沦陷了的家乡回到柳州的时候，我也逃出了日寇占领的马来亚，回到柳州，我们惊喜交集地见了面。可是见面不久，我们正想干一点文学事业，多写点东西，日寇又大举进攻湘桂，反动腐败的国民党军队，不战而逃。我们随着仓忙逃难的滚滚人流，夹杂在国民党的溃逃队伍中，身背行囊茫茫然地逃奔贵阳。

宁婴的长诗《溃退》，便是具体而形象地描绘了这一幅惨淡景象的画图。它揭露了国民党反动部队的腐败无能，诉说了广大人民所遭遇的灾难和不幸。诗的战斗性很强，是他思想上的可贵的跃进。诗中所描写的真实画面，也是我目睹过和经历过的，我比别人感受的更加深刻，我们一同睡过毛坑，推过板车，走过惊慌的村镇，越过荒僻的峻岭崇山。宁婴以强烈的感情，作了历史的纪录，使人忘不了旧中国的可悲命运。（《溃退》将另行出版，这个选集只选取了它的“序诗”。）

在贵阳，宁婴和我们一起，接受了党的派遣，又跨过了云贵高原，翻过“积雪的大山”，“攀越山洪飞跃的铁索”，“踏尽崎岖迂回的荒径”，穿越了敌人的封锁线，回到敌后粤桂边境的大坡山。在大坡山，李济琛在我党的支持和指导下，树起了反蒋抗日的旗帜。我们都在李的部队里做政治工作。部队势力很小，又有多少地盘，前后左右都有伪军、国民党的地方团队和土匪队伍，四面包围，处境是困难的；生活极其艰苦，而宁婴不避艰苦，工作认真，情绪饱满，把妻子、弟弟也接到部队来。

不久，日寇投降，宁婴又回到广州来了。经历了七年的离乱和艰苦生活的锻炼，宁婴把自己性格上脆弱的一面磨掉了。在广州，他以新的战斗姿态，复刊了《中国诗坛》，积极投身于民主运动。随着汹涌澎湃的民主浪潮，和国民党的假民主、真独裁、假和平、真内战的法西斯专政开展了斗争。他的家，不仅成了革命诗友们的集中地，而且成了我们党的一个联络点。他对共产党感情深厚，诚实地跟着党走，按着党的指示去工作，对党有着热切的追求。

当蒋介石反动政权撕毁了“双十协定”，将要发动反共反人民内战的时候，宁婴坚定地叫

喊着：

别痴想那阳光的温煦  
别痴想那绿洲的柔丽  
我们已经吃尽了苦  
我们还得冲破  
这最后的危难呵

盘踞在广州的蒋介石的走狗们，不顾共产党的劝告，不听人民的呼声，推行独裁统治。随着重庆当局的镇压民主运动之后，在广州又公然查封了大量进步书刊，反动气焰嚣张。宁要针锋相对地站出来，愤怒地呐喊：

我的愤怒  
快要烧起一团火。

让它烧起来呵！  
让它象火箭  
射向  
民主的敌人！

蒋介石一伙点燃了内战的火花，广州又重

新跌进昏暗的世界里。宁婴掩护和帮助了一些革命的战友逃走，最后，自己也撤退到香港去。

在香港，宁婴洋溢着战斗的激情，写了许多政治性很强的讽刺诗，编成一个集子《民主短筒》。它抨击了“中国的独裁者”，嘲弄了帮助国民党打内战的美国的所谓“割去中国盲肠”的“专家”，讽刺了以“公证”面目出现去调停“内战”的所谓“中间人士”，讥笑了国民党骗人的“金圆券”。宁婴站在正确的立场上，去戳破那些为国民党打掩护的反共分子的虚假面貌。

在香港的几年间，宁婴除继续主持《中国诗坛》编务外，还参加了各种社会活动。此外，又遵照了港粤文协的指导，开始进行粤剧界的团结和剧改的工作。众所周知，进步的文艺界和粤剧是隔绝的，把粤剧看作一种落后的剧种，既不看，也不懂，人员之间也缺乏接触和往还。要宁婴去做这个工作，只因为他过去爱看粤剧，没有“洁癖”，于是他乐于接受这生疏的任务。透过曲折的关系，他接触了一些著名的编剧和演员，彼此交换意见，探讨了新粤剧的改编问题，为解放后的剧改工作打下了最初的基础。

解放后宁婴就在党的领导下搞剧改工作。



他热爱新诗，搞了很久的诗歌运动，写了不少优秀诗篇，是受人推崇的著名诗人，一旦放弃了自己的本行，并非他的意愿，但他服从党的需要，欣然地接受了新的任务。他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下，积极工作，勤奋钻研，经常抱病从公，使粤剧改革获得显著成绩。

宁婴是一个善良、温厚、驯顺而坦率的人，入党以后，把自己看作是党的“驯服工具”，党怎么说他就怎么做，组织性很强。粤剧界中人事纷繁，要把改人改戏的工作搞好，是十分艰巨的。但他虚心诚恳，作风正派，办事公道，任劳任怨，以平等友爱的态度与艺人相处，和老艺人，年青艺人，名牌老倌以至“梅香”，都团结得很好，成为粤剧界中的知心人。这样一位可爱的文艺战士，在“四人帮”横行猖獗的昏暗年月里，竟遭受了残酷的打击，心灵备受折磨，但他嫉恶如仇，对“四人帮”祸国殃民的行为，采取了仇视蔑视的态度，对其帮派体系进行了坚决的斗争。

长期以来，他为剧改工作呕心沥血，没有多少时间考虑诗歌创作了，除了参加一些诗歌座谈会，关心一些新诗人的成长之外，很少写诗。曾计划写一篇表现土改的长篇叙事诗，只